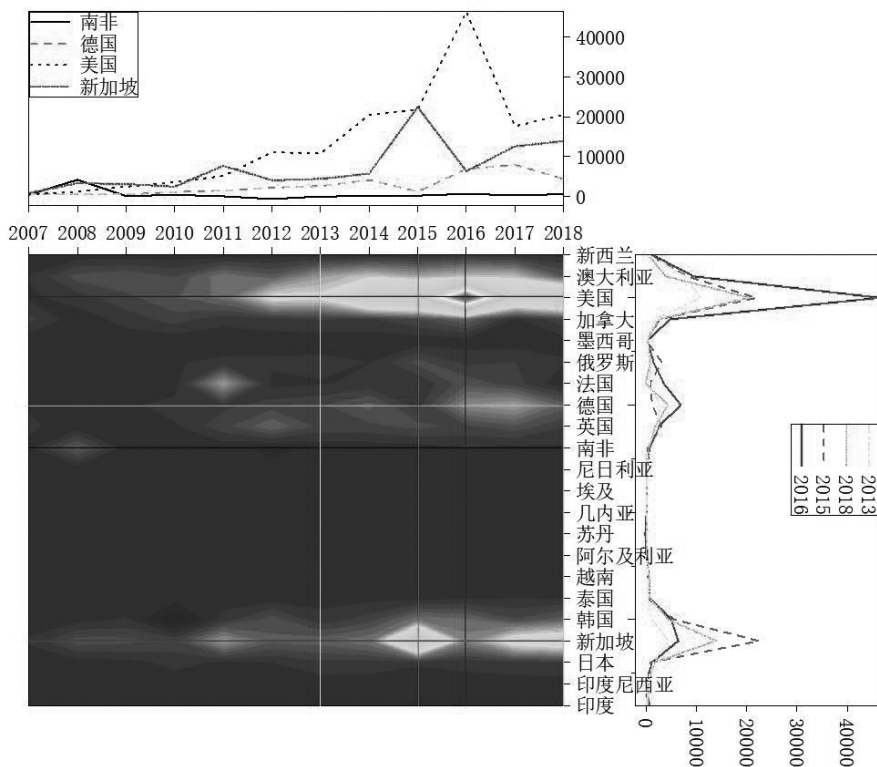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现实背景

(1) 中国正在经历从投资输入国向投资输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图 1-1 是 2007—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逆向知识溢出热图。从横向切线来看，中国在美国、德国和新加坡进行投资产生的逆向知识溢出相对明显，而在非洲等地



请扫描二维码查看
彩图

图 1-1 逆向溢出知识时空剖面图

资料来源：依据国内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等绘制

区投资产生的逆向知识溢出较弱。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馈到中国的逆向溢出知识日益增加;英、德、法在 2017 年之前逐渐增强,但 2017 年之后出现了衰减;美国在 2016 年之前逐渐增强,之后却表现出减少趋势。从纵向时间切线来看,2007—2018 年国内企业对外投资产生的逆向溢出知识日益增加,而且自 2017 年开始,美国逆向知识溢出的核心地位有所减弱,新加坡等地区的逆向知识溢出有所增强。逆向知识溢出热点地区变化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一是欧美国家对中国实施更加严格的投资审查制度,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从而减少了内、外企业之间的合作机遇;二是“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沿线国家之间的双向开放,并为外资入境和对外投资提供了新的平台。

(2) 全球保护主义强化与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面临新挑战。首先,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收紧了外资入境审查政策,国内企业在当地寻求合作的困难和风险加大。2017 年以来,各国投资限制政策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欧美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纷纷出台限制外资入境政策,将对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外商投资纳入审查范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面临更大的挑战。其次,各国日益重视在高新技术领域中取得、保持或者扩大竞争优势,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受到多方钳制。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同时也加强了出口管制和外资审查来保护自身的竞争优势。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为防止我国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有意限制我国投资者在当地的投资活动。最后,部分欧美国家针对国有企业投资审查泛化,我国国有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空间收窄。美国和部分欧盟国家的外资审查政策均有涉及国有企业的条款,而且这些条款对于外国政府相关交易的界定较为宽泛,不仅包括政府控股企业,还包括代表政府意图的企业等,这意味着我国国有企业将面临更高的投资壁垒。

(3) 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势头良好,但成功率不高。一方面,由于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少企业投资的目标公司资产质量较差,长期以来沉淀了较多不良资产,还存在大量的负债,而投资者对潜在的风险浑然不觉,为之后的投资失败埋下伏笔。不充分的信息披露和价值观差异导致投资者在投资前无法对境外目标企业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较为准确的评估,再加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造成投资者在交易前对投资合作形成不恰当的预期,从而导致投资失败。例如,上汽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SSANG YONG Motor Company)时急于将被收购企业的车型和生产线搬到中国,而忽视了对双龙汽车公司基本面与价值观的了解,致使并购完成之后面临双龙汽车公司破产的风险,最终导致上汽损失了 40 亿元人民币并放弃了对双龙汽车公司的控股权。另一方面,部分国家政权频繁更迭、冲突不断,外加法律不健全、政府执行力不高,形成了高政治风险,即便一些国家法律制度貌似健

全、投资环境优越,但却时常进行干预性的投资安全审查,这对境外投资者而言同样是潜在的政治风险。当国内投资者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并不熟悉时,很容易造成损失与投资失败。例如,华为收购美国三叶公司(3Leaf)时低估了交易的敏感性,并未及时向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申报,从而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最终华为被迫放弃交易,并损失了前期投入的部分合作资金。

由背景(1)、(2)和(3)可知,当前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如火如荼,但整体上却存在两个矛盾:其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与国内投资企业寻求境外前沿知识和专业化知识的矛盾。国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标的通常是互补型或互惠型,在投资合作过程中国内投资者与国外关联企业能够获得彼此所需的利益,实现双赢。然而,出于保护自身优势的目的,发达国家逐渐加强了对境外企业投资尤其是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的审查。例如,2017年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提出有权拒绝涉及“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外来投资;2018年美国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法》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敏感科技行业等。境外知识资源是加速企业技术进步的“催化剂”,但国内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频频受阻,难以形成有效合作,从而迫使国内企业寻找新的投资思路与知识策略。其二,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标转变与东道国市场不透明的矛盾。投资者知识需求改变带动投资策略改变,而将对外直接投资目标调整到新领域或同一领域的更深层次时需要重新选择东道国市场或者投资标的。在前期阶段,投资者往往对新的东道国市场和投资标的缺乏全面认识,继而因为难以取得自身所需知识资源而造成投资效率低下甚至失败。与此同时,投资全新的标的需要企业自身具备怎样的资源条件同样决定了投资活动是否合理有效。

1.1.2 理论背景

(1) 全球保护主义抬头与逆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关于英国企业国际资本流动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Hymer从企业发挥特定优势的视角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研究体系逐渐建立起来(Dunning, 1977; Buckley & Casson, 1981; Rugman, 1981; Alfaro et al., 2004; Harms & Meon, 2018)。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逐渐增加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数量与频率,此后国内外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尤为丰富。步入21世纪,更多新兴国家加入对外直接投资行列,催生了有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资源寻求新理论,相关成果从制度环境(Gugler & Boie, 2008; Stoian, 2013; Paniagua et al., 2017)和投资区位选择(Henisz & Delios, 2001; Kang & Jiang, 2012; Piperopoulos et al., 2018)等角度

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加强了外资审查制度并“发力”WTO改革,试图扩大国际竞争优势和引领下一代国际贸易规则。国际投资环境变化进一步将国内外研究目光吸引到了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学者们一致认为当下发展中国家要从海外关联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关联企业获取知识资源面临诸多阻碍与风险。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近几年的研究强调了政策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Azzimonti, 2018; 张海波和李彦哲, 2020; 齐俊妍和任奕达, 2020; 莫敏和区富祝, 2020), 所得结论在宏观政策层面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2)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内在机理尚待深入研究。2008年长虹的国际化战略初显,旨在培育具有产业广度的全球投资能力。2016年长虹的国际投资合作达到新高度,其间投资了包括ABB和IBM在内的多家国际知名企业,涵盖云计算、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家电制造等领域。长虹每进入一个领域首先会摸透该行业的人才和管理关键在哪里,并快速获取行业内人才、技术、设备等战略性资源,凭借广阔的国际反馈知识稳固在商业领域的龙头地位。与长虹不同,吉利的国际投资始终围绕汽车行业展开,无论是2006年与LTI成立合营企业还是2009年收购沃尔沃,其目标就是要获得汽车行业内更为前沿、高效的技术和人才资源。通过深耕汽车行业,吉利已拥有全面、灵通的行业消息和管理经验,甚至掌握了部分垄断性技术优势,成为国内汽车行业的领头羊^①。企业技术进步既依赖自主知识资源(Drongelen et al., 2003; Bengoa et al., 2017; Cheng & Li, 2018),也需要外部知识资源的支持(Shireen, 2011; Asmussen, 2013; Athreye et al., 2016)。长虹和吉利都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境外知识资源,进而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的,但长虹和吉利的对外投资计划反映了不同的思路:长虹追求国外反馈知识广度,试图获取多行业逆向溢出知识;吉利则更追求反馈知识深度,试图增加领域知识专业化水平。

当前研究对于上述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与结果的阐释尚显不足。在未深入区分异质性驱动机制的条件下,逆向溢出知识被公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根源(Li et al., 2016; Zhou et al., 2019; 谭云清和马永生, 2020),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多集中在“怎样的因素”影响投资企业吸收逆向溢出知识上,如从投资企业知识吸收能力(邵玉君, 2017; 魏凡等, 2017)、母国政策制度(赵伟等, 2006; Cozza et al., 2015; 李勃昕等, 2020)、区位选择(Kang & Jiang, 2012; 李延喜等,

^① 资料来源于全球案例发现系统“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素材库”板块(<http://www.htcases.com.cn/index.html>)。

2020)和风险控制(韦军亮和陈漓高,2009;周伟和江宏飞,2020;孙林和周科选;2020)等角度讨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3)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与知识策略调整机理与框架亟待弥补。对于投资者面对国际市场投资环境的改变以及自身知识需求的改变应该如何及时调整投资策略与知识策略这一问题,当前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如税收制度(张晓瑜等,2018;肖文和韩沈超,2018;李俊,2020)、产权制度(齐晓飞等,2015;靳巧花和严太华,2019;Devesh & Zoltán,2020)和国家层面的地区合作(Cheng & Kwan,2000;田素华和王璇,2017)等。宏观层面的调整策略多强调政府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来帮助国内投资者应对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而关于国内投资企业应该如何调整对外投资策略和知识策略则较少涉及。为数不多的微观研究从生产率(王桂军和张辉,2020)、出口经验(闫周府等,2019)、融资约束(晋盛武和何珊珊,2017)和高层管理(田轩和孟清扬,2018)等方面讨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调整策略,所得结论丰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体系。但从微观层面来看,还没有研究探讨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和知识策略的调整框架,所以当企业想要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和知识策略时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理论框架,这增加了国内投资者的试错成本。

由理论背景(1)、(2)和(3)可见,日趋成熟的研究体系中依旧存在两个理论缺口:其一,对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探讨不足;其二,尚未完整构建出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与知识策略调整框架。这显然不利于应对现实背景下的两个矛盾。补充以上研究空缺成为本研究的最终目标。整体而言,已有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理论体系对本研究起到了引导与支撑作用,反过来,本书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研究体系,为国内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升投资效率与技术进步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1.1.3 问题的提出

现实背景表明当前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面临两个亟须调和的矛盾,而理论背景表明当前相关理论体系并不能完整且恰当地为破解现实情境中的两个矛盾提供理论支撑。对此,本书提出了“为什么”“真的这样吗”和“怎么办”三个问题来应对现实亟须而理论不足的藩篱,并且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为国内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现实可操作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和知识策略调整框架。

(1) 问题一(为什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驱动机制是怎样的?不同企业之间有何差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投资企业技术进步的观点已经屡见不鲜,但多数研究仅停留在现象描述和实证检验阶段,相对笼统地讨论逆向溢出

知识在企业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并没有系统地论证和剖析内在驱动机制,虽然所得结论有益于弥补理论空缺并提出有利于企业改进对外投资策略以及取得技术优势的举措,但一概而论的做法并不利于研究成果的具体应用,有些时候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本书拟从逆向溢出知识结构出发,深入剖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驱动机理,依据企业内部化理论和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构建逆向溢出知识结构理论框架,彻底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从而为接下来的“怎么办”打下理论根基。

(2) 问题二(真的这样吗): 多维度 and 动态视角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 这一问题本质上是对上一个问题所得理论框架的实际检验。与已有研究的实证分析不同,本研究将从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视角分维度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内在驱动机制,并且融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演化过程,进一步分阶段检验不同逆向溢出知识维度发挥的技术进步效应。另外,为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与有效性,本研究将从理论认知与实践数据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为理论根基的实证结果上“双保险”。

(3) 问题三(怎么办): 国内投资企业应该如何调整对外直接投资和知识策略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知识需求的变化? 几乎没有文献对该问题作出正面回答。本书在深入探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驱动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助古诺模型,分别从东道国市场条件和自身生产条件出发论证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如何制定投资和知识策略才能在实现知识结构调整的基础上确保收益最为合理,为国内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合理调控逆向溢出知识结构提出现实可操作的意见。此外,本书还针对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框架中的国外市场条件设计了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的国外市场条件自查表。

1.1.4 研究意义

本研究将在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视角下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从动态视角阐述逆向溢出知识结构不同维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时间演化特征,借助古诺模型分析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机理,为国内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调整投资策略与知识策略提供可借鉴的科学依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①帮助国内投资者树立阶段性的知识维度倾向意识和动态对外直接投资意识。本书拟构建阶段性的逆向溢出知识需求逻辑以及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为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逆向溢出知识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提供参考;②帮助国内投资者厘清为达成知识结构调整目的,自身所应具备的条件和东道国市场所应具备的条件是怎样的。本书拟通过投资者的成本收益分析寻

找有效的知识结构调整路径,帮助国内投资者在调整逆向溢出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实现收益最大化;③通过设计国外市场条件自查表给投资者提供国外市场部分显性与隐性特征数据,用这些特征数据结合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框架中的东道国选择条件,帮助投资者筛选出投资目的地,减少试错成本与时间成本;④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依照国内投资者知识结构调整需求和投资需求,凝练出相匹配的政策举措,力图在帮助国内企业提升创新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时,降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增加企业投资效率和知识反馈效率。

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借助相应的理论框架做支撑,本研究的理论意义表现在:①将知识结构理论与逆向溢出知识概念相融合,从知识的不同维度探究逆向溢出知识到底是怎样促进投资企业技术进步的,以弥补有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机制性理论空缺;②打破以往研究中逆向溢出知识在企业技术进步中的静态属性。本研究拟借助内部化理论和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从动态视角观察、归纳和总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标的和知识结构调整的阶段性特征,将原有的静态研究范式延伸到更加贴合实际的动态化视角;③在溢出动态视角下重新审视知识深度维度和知识强度维度之间的差异,解决当前研究中知识强度概念和知识深度概念混沌不清的问题。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 研究思路与内容框架

本研究以逆向溢出知识结构作为理论根基,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内在机理,以及企业在面对自身知识需求变化和部分发达国家的“知识壁垒”时应该如何调整逆向溢出知识结构。通过回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驱动机制为何?不同企业之间有何差异?”“多维度和动态视角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和“国内投资企业应该如何调整对外直接投资和知识策略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知识需求的变化?”三个问题完成对核心内容的探究,具体可按照“是什么”“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怎么办”和“应该这样做”的逻辑递推路线展开讨论,如图 1-2 所示。其核心研究框架如图 1-3 所示。

首先,书中阐述了中国正在经历从投资输入国向投资输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球保护主义强化与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面临新挑战,以及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势头良好但成功率不高等现实背景;同时,梳理了与现实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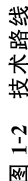


图 1-2 技术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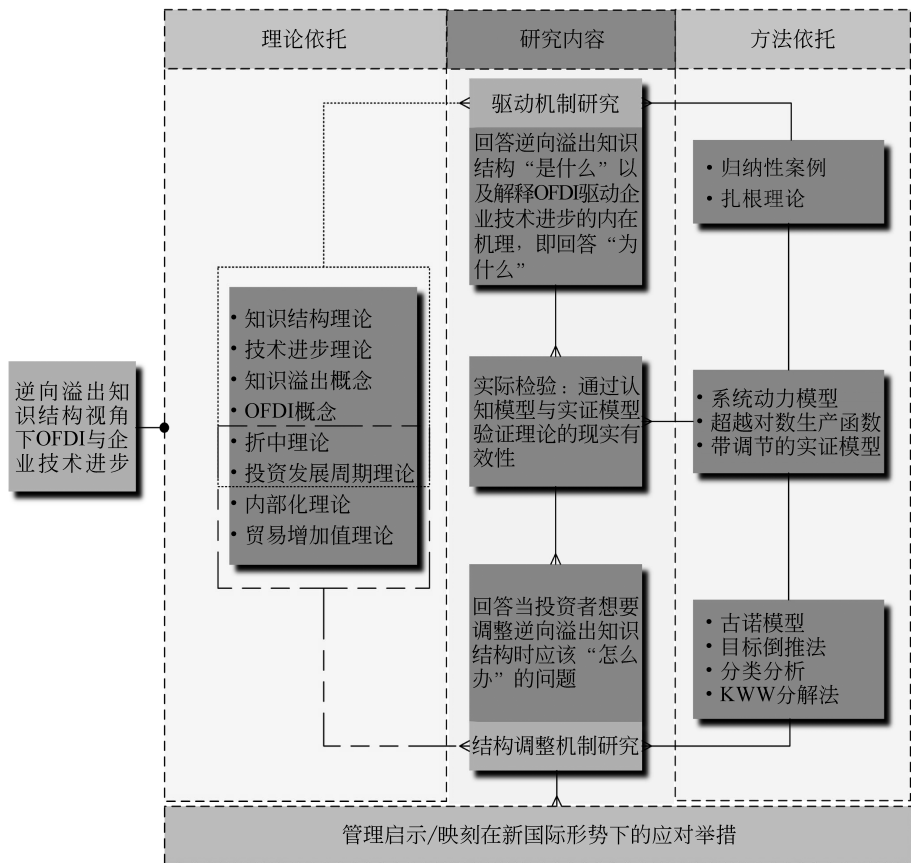


图 1-3 研究框架

和研究主题相对应的理论背景,借此提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围绕研究主题与核心问题综述了“知识与知识溢出”“企业技术进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知识结构理论”等 7 个方面的相关文献,寻找研究缺口并为接下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打下基础。

其次,依据吉利、海尔和均胜等 5 家民营企业以及上汽、北汽和海信等 5 家国有企业进行多案例归纳式研究,从定性的角度构建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视角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框架,由此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同时,借助系统动力学模型与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所得理论框架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及其是否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情境形成有效的对话,从而回答“真的是这样吗”的问题。

再次,运用古诺双寡头模型在成本与收益的视角下探究逆向溢出知识结构内在调整机制,包括东道国市场中参与主体均为同质性条件下的深度抉择和参与主

体异质性条件下的广度抉择,以此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最后,依据所得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机理设计针对“国内投资企业应该如何调整对外直接投资和知识策略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知识需求的变化”问题的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框架和国外市场条件自查表,具体说明“应该怎么做”。

针对以上逻辑路线,本书主要设计了7章加以论述:①绪论。该章的主要任务包括回顾现实与理论背景、引出研究问题、阐述研究意义、描述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研究重难点和创新之处等。②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该章对本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和概念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梳理,在厘清相关文献成果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找出当前研究体系中的缺口,为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奠定基础。③逆向溢出知识视角下OFDI驱动企业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该章主要解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内在机理为何”的问题,通过知识结构理论进一步延伸出逆向溢出知识结构概念,以此为理论工具突破当前研究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机理解释不足的问题。该章的理论构架将为后续实证分析和建立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框架打下研究基础。④逆向溢出知识视角下OFDI驱动企业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该章的任务是实际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机制和理论框架。为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与有效性,本研究从理论认知与实践数据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为检验结果上“双保险”,确保所得到的理论框架是合理有效的且能够与现实情境进行对话。⑤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机制研究。该章的主要任务是分析逆向溢出知识结构的调整机理,借助知识不对称及企业异质性的古诺模型讨论不同模式下增加逆向溢出知识深度和广度的成本与收益,借此找到调整收益最大化的结构调整机理。⑥“内拉外推”视域下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框架。在已获得的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机理基础上,针对“国内投资企业应该如何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和知识策略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知识需求的变化”设计具体的逆向溢出知识调整框架和基于调整框架的国外市场条件自查表。⑦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该章的主要任务是对本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讨论本研究与其他文献成果的不同之处以及取得的进展,从研究结论中萃取相应的政策启示,同时,提出本书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展望相关领域的未来研究动向。

1.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总体上遵循“文献梳理→案例分析(构建理论框架)→现实检验→调整机理分析→调整框架设计”的研究思路,主要采用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①案例分析部分采用多案例对比和扎根理论方法构建全书的理论根基。首先,通过实地调研、企业年报和各大门户网站新闻资料等收集研究数据;其次,对收

集的数据进行初步整理并通过小组讨论构建理论编码;再次,借助不同渠道的资料数据对所得理论框架给出例证和支撑;最后,在小组内通过头脑风暴补充和完善所得理论框架。

② 现实检验部分主要采用以仿真为基础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和以面板数据为基础的计量模型。首先,借助SD仿真模型从认知的角度初步检验理论架构的合理性并提出理论假设;其次,借助调节模型与国内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认知与假设,双重检验理论模型的现实有效性。实证过程中需要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计算企业技术进步指数。

③ 调整机理部分运用古诺模型加以分析。首先,提出模型构建的假设条件,包括东道国的市场条件和不同入场模式下的成本;其次,构建投资者在不同入场模式下的收益函数,对异质性情境下的成本和收益展开分析;最后,依据所得结果阐述合理调整逆向溢出知识结构的内在机理。古诺模型通常被作为寡头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其简化了分析过程,并且可以通过放宽主体假设条件推广到一般情况。借助寡头市场假设有助于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对企业最终收益的影响,这与本研究具有契合之处。

④ 调整框架设计部分主要采用归纳分析方法展开研究,借助前文中的逆向溢出知识调整机理,整合出具有针对性的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框架。为了强化调整框架的实用价值,本书运用KWW贸易增加值分解法针对框架中的东道国市场条件设计了国外市场条件自查表。构建国外市场条件自查表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给投资者提供国外市场部分显性与隐性特征数据,用这些特征数据结合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框架中的东道国选择条件,可以帮助投资者筛选出投资目的地,减少试错成本与时间成本。

与以上研究方法相对应,本研究主要用到了STATA、Origin、GeoGebra、Vensim和NVivo等软件,分别在数据资料分析和图表绘制等方面发挥相应的作用。相关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企业官网年报、门户网站数据资料、访谈数据、中国工商管理案例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数据等。

1.3 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之处

1.3.1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本书的研究重点可概括为两句话,一是讲清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到底是怎样驱动技术进步的,二是说明白到底应该怎样调整逆向溢出知识结构。由此延伸出“一个支撑性理论模型+两个实际验证模型+一个调整机理模型”:①“支撑性理

论模型”是整个研究的根基,其作用在于为讨论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自身技术进步的内在机理提供理论范式。构建该理论的关键在于从驱动技术进步的内核因素——逆向溢出知识出发,然后在逆向溢出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根源。其难点在于找到一个与逆向知识溢出相契合的理论范式,该范式要能解构技术驱动作用的条理。②“实际验证模型”本质上是验证支撑性理论模型的现实有效性。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对被检验理论框架有一个初步的认知,这一认知是从理论中来的,并且可由此构建表征模型模拟可能的现实情境。以仿真模拟为代表的初检验可能与现实具有一定的偏差,这要求进一步借助现实数据佐证仿真结果的有效性。该部分的关键点在于设计“双重保险”以确保理论根基是准确有效的,而“双重保险”是指初步表征模拟和进一步的数据检验。③“调整机理模型”是整个研究的最终归宿,就是要解决国内企业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投资阻碍和自身知识偏好转变时到底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该部分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既能将不同调整策略作为备选项进行比较,又能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萃取相应的管理启示。当然,还需要寻找一种相适应的方法来强化调整机理模型的实用价值。

本书的研究难点包括:①找到能够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理
论范式。针对该难点,作者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将不同的理论嵌入其中进行试
错,确定最能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内在机理的方法论。②确保理
论框架是对现实的准确反映。对理论合理性的检验方法通常包括回归分析法、系
统仿真法和验证性案例法。本书中的理论框架来源于对现实案例的探索,因此在
实际检验过程中为避免前后方法产生重叠性便不再采用验证性案例法,而是采用
系统仿真法和回归分析法对所得理论机制的合理性进行检验。为了将两种检验方
法通过一定的逻辑关系串联起来而不显得过于分裂,本书将仿真分析结果结合一
定的理论作为计量分析的假设,然后通过现实数据回归分析假设是否成立,以此克
服“双重检验”过于分裂的难题。③构建能够用来阐述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机理
的理论模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到底应该如何调整逆向溢出知识结构,如何将相
对笼统和概念化的调整思路清晰、准确且细致地描述出来,也是需要不断试错的过
程。另外,在这一部分还应该厘清调整逆向溢出知识与收益最大化之间的逻辑
关系,到底是先调整然后确保收益最大还是确保收益最大然后再调整。

1.3.2 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书围绕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内在驱动机制为何以及国内企
业如何调整投资策略和知识策略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知识需求的变化两
个基本问题,在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视角下构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

理论机制,并在该理论框架下借助古诺模型详细讨论逆向溢出知识结构调整机理与框架。与以往研究相比,本书具有四个创新之处:①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已有研究讨论了逆向知识溢出与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联性,而且多数成果支持了溢出有利的观点,但很少有文献相对全面地揭示其内在机理。本研究从知识结构的视角解释了逆向知识溢出为什么会驱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技术进步,并且通过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了书中所提驱动机制的有效性。②概念、术语的新阐释。知识深度和知识强度的概念在历来的研究中始终未被严格界定,导致其在不同研究中混淆使用。本研究在动态视角下重新审视知识深度和知识强度的概念,认为在同时考虑知识交互频率、知识数量 and 专业化水平时,知识深度与知识强度之间的差异性被放大,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以参考的界定依据。③理论观点的新突破。既有研究体系相对笼统地讨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结论多为静态分析。实际上,逆向溢出知识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投资阶段逆向溢出知识的不同维度所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当前研究几乎没有关注这一点,本研究拟借助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突破原有的静态研究范式,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研究注入新的理论观点。④成果应用的新价值。针对国内投资者应该如何及时调整对外投资策略来应对知识需求变化和国际形势变化,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从微观视角更系统地描述了企业面对外来阻碍与自身知识需求变化时的应对举措,对国内企业投资实践和政策规制具有全新的应用价值。

1.4 本章小结

作为开篇章节,绪论部分着重阐述了本书的选题背景、研究问题、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等。首先,结合现实背景的实际需要和理论背景的短板,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驱动机制为何?不同企业之间有何差异?”“多维度和动态视角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技术进步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国内投资企业应该如何调整对外直接投资和知识策略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知识需求的变化?”。其次,针对三个问题设计相应的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全书共分为7章,按照“是什么”“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怎么办”和“应该这样做”的逻辑递推路线展开讨论。再次,依据研究内容提出相应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其中案例分析部分采用多案例对比和扎根理论方法构建全书的理论根基、现实检验部分主要采用以仿真为基础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和以面板数据为基础的计量模型、调整机理部分运用古诺模型加以分析、调整框架设计部分主要采用归纳分析方法展开研究。最后,鉴于本书的研究内容等阐述本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之处。